



Library of Classical Studies

西方古典学研究

羞耻与必然性

〔英〕伯纳德·威廉斯 (Bernard Williams) 著 吴天岳 译



Shame and Necess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4513422

B82-095.45
02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羞耻与必然性

Shame and Necessity



〔英〕伯纳德·威廉斯 (Bernard Williams) 著 吴天岳 译



北航

C170005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82-095.45
02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89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羞耻与必然性/(英)威廉斯(Williams, B.)著;吴天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西方古典学研究)

ISBN 978-7-301-23434-1

I. ①羞… II. ①威…②吴… III. ①伦理学-研究-古希腊
IV. ①B82-09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254 号

Shame and Neccesity, 2nd Edition, by Bernard Williams, with a foreword by A. A. Long,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2008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书 名: 羞耻与必然性

著作责任者: [英]伯纳德·威廉斯 著 吴天岳 译

责任编辑: 王晨玉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434-1/B·11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5.5 印张 218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黄 洋 (复旦大学)

高峰枫 (北京大学)

编 委: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

李 猛 (北京大学)

刘津瑜 (美国德堡大学)

刘 玮 (中国人民大学)

穆启乐 (Fritz-Heiner Mutschler,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 北京大学)

彭小瑜 (北京大学)

吴 飞 (北京大学)

吴天岳 (北京大学)

徐向东 (浙江大学)

薛 军 (北京大学)

晏绍祥 (首都师范大学)

岳秀坤 (首都师范大学)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

张 巍 (复旦大学)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古典学是西方一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问,初时是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研读和整理古代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18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逐渐发展成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人文学科。

在我国,明末即有士人与来华传教士陆续译介希腊拉丁文献,传播西方古典知识。进入20世纪,梁启超、周作人等不遗余力地介绍希腊文明,希冀以希腊之精神改造我们的国民性。鲁迅亦曾撰《斯巴达之魂》,以此呼唤中国的武士精神。1940年代,陈康开创了我国的希腊哲学研究,发出欲使欧美学者不通汉语为憾的豪言壮语。晚年周作人专事希腊文学译介,罗念生一生献身希腊文学翻译。更晚近,张竹明和王焕生亦致力于希腊和拉丁文学译介。就国内学科分化来看,古典知识基本被分割在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之中。1980年代初,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创者日知(林志纯)先生始倡建立古典学学科。时至今日,古典学作为一门学问已渐为学界所识,其在西学和人文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方古典学研究”丛书,希冀它成为古典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一个知识与精神的园地。“古典学”一词在西文中固无歧义,但在中文中可包含多重意思。丛书取“西方古典学”之名,是为避免中文语境中的歧义。

收入本丛书的著述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开始出现一批严肃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尤其是立志于从事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青年学子。他们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其研究往往大胆而独具见解,代表了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前沿水平和发展方向。

二是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我们选择翻译出版在一些重要领域或是重要问题上反映国外最新研究取向的论著,希望为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一定的指引。三是西方古典学研习者亟需的书籍,包括一些工具书和部分不常见的英译西方古典文献汇编。对这类书,我们采取影印原著的方式予以出版。四是关系到西方古典学学科基础建设的著述,尤其是西方古典文献的汉文译注。收入这类的著述要求直接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译出,且译者要有研究基础,在翻译的同时做研究性评注。这是一项长远的事业,非经几代人的努力不能见成效,但又是亟需的学术积累。我们希望能从细小处着手,为这一项事业添砖加瓦。无论哪一类著述,我们在收入时都将以学术品质为要,倡导严谨、踏实、审慎的学风。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领读者走进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世界,也盼望西方古典学研习者共同关心、浇灌这片精神的园地,使之呈现常绿的景色。

“西方古典学研究”编委会

2013年7月

献给帕特里夏

ἐπαμέροί τί δέ τις; τί δ' οὐ τις; σκιᾶς ὄναρ
ἄνθρωπος. ἀλλ' ὅταν αἴγλα διόσδοτος ἔλθῃ,
λαμπρὸν φέγγος ἔπεστιν ἀνδρῶν καὶ μείλιχος αἰών.

朝生暮死者：是某人又如何？不是某人又如何？人类，
泡影之幻梦。然而，当宙斯赐予的光辉绽放时，
降临于众人的是四溢的光彩和安详的岁月。

——品达《皮托竞技胜利者颂》第8首，95—97行*

* 原文无英译，此处翻译参考 Gregory Nagy 和 Roy Arthur Swanson 的英译文。其中，95 行的问句亦可译为：“人為何物？人非何物？”——译者注

序 言

本书根据我 1989 年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的萨瑟讲演 (Sather Lectures) 写成。该系列讲座按惯例由特别杰出的古典学者主讲, 而我有义务向读者, 还有萨瑟委员会——他们的邀请赋予我荣耀, 这荣誉我分外珍惜——说明, 我基本上不是一个古典学者。我是个曾受过过去所谓古典教育, 但后来成了哲学家的人, 主要通过古代哲学领域的工作一直还在接触希腊研究。 ix

我必须提到这一点, 更是因为本书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上述经历可能暗示的限度之内。我确实讨论了一点古代哲学(篇幅最长的是在第五章, 论及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观点), 但在本书大部分章节中, 我讨论的作者并不是哲学家而是诗人。而且, 我试图将他们作为诗人来讨论, 而非为哲学提供些富含韵律的实例。在第一章中, 我解释了这么做的理由。诚然, 我尤其关注还没有哲学作者, 或者说只有很少哲学残篇传世的年代希腊人的想法, 但这并不是我转向诗歌的主要理由。

那些自身学术不精的哲学家理应为之受到谴责。同时也必须指出, 有些文学研究者看起来不愿接受这样的想法, 即他们的反思很可能包含着糟糕的哲学。或许, 他们至少应该意识到所冒的危险。这并不是说, 他们去冒这个险是做了一件错事——学术正统 (orthodoxy) 是有标准的, 哲学(在一个古老的笑话里)却是人尽可夫的荡妇 (anybody's doxy)。我要说的是, 学术, 至少当它试图说出些有趣的东西时, ① x

① 它不这样时也是如此。与此相关的是, 把学术的某一方面, 也就是文本校勘 (textual criticism), 理解成纯粹技术化的学科。诚然, 古文书学与文本传承的技术考察增添了文本解释的力量, 忽略它们的人要自担风险, 但是某些文本编者夸大了文(转下页)

2 羞耻与必然性

不能完全凭着自己的资历旅行。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打算做些什么,我们都不得不比我们应当能做好的做得更多。就像 T. S. 艾略特说的:“当然,一个人可能‘走得太远’,可除了那些使我们能够走得太远的方向,别的走起来根本就没意思;而且只有那些愿意冒‘走得太远’的险的人才有可能发现一个人能走多远。”^②

艾略特的评述令人赞赏,不过,对于一个处于我这种境地的人来说,它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激励,还有警告。如果说,那些不习惯处理文学文本的人有时可能会太过冒失而不能满足学术的要求,那么,从评论应富含想象力的标准看,他们也会有走得不够远、显得无力或肤浅的危险。一种未受当代文学研究论著影响的坚定洞见,很可能最终仅仅代表着某种未被遗忘的偏见。人们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要将非专业主义的缺陷转换为英雄主义的回报,并没有一条可靠的路径可走。

我得承认,这场演出的大半时光,我是在用“安格尔的小提琴”(Violon d'Ingres)* 演奏,与此同时,令我欣慰的是,至少当年是些良师引我入门。在牛津读本科时,我有幸受教于本世纪最为出色的两位古典学者:爱德华·弗伦克尔(Eduard Fraenkel)和埃里克·多兹(Eric

(接上页)本校勘相对于可争议的风格和义理问题的独立程度。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豪斯曼(Housman)在颂扬本特利(Bentley)时所使用的医学隐喻:“当你面对棘手的疑难句读或训释,泥滞不前……然后遇到本特利,看他指着患处,说:‘你这里痛,还有这里痛。’这时,你脑子里闪现这样一句话:‘Lucida tela diei(白日里闪亮的标枪)。’”(《马尼利乌斯整理前言》[M. Manilii Astronomicon Liber I, xvi]。中译文参照了《西方校勘学论著选》,苏杰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下同)实际上,在同一篇文章中,豪斯曼对本特利提出了不可忽略的斥责,“尽管本特利发现真相的能力在学术史上无人能匹,但他去发现的愿望并不同样强烈。评论家如波森(Porson)、拉赫曼(Lachmann),尽管在 εὐστοχία[射技]和 ἀγγίνοια[洞察力]上略逊一筹,却凭借他们严肃无私的动机和对待自身的诚实而将他钉在了耻辱柱上。”(xiii)校勘运用失控的突出例证,参见下文,第五章,注释39。(本书未加注明的注释均为作者所作的尾注。随文的译者注均以方括号标注,下同。)

② 为哈利·克罗斯比的《金星凌日》(Harry Crosby, Transit of Venus)所作序言,第9页。[下文所引页码,凡未注明,皆为英文版页码。——译者注]我的这一引用转自克里斯托弗·里克斯(T. S. 艾略特与偏见)(Christopher Ricks, T. S. Eliot and Prejudice),171页。

* 法国画家安格尔亦擅长小提琴,曾在图卢兹的乐团中任职,不过为其绘画的锋芒所掩。这一习语用来指某人出于自身的热情而投身于自己专业之外的领域。顺带一提的是,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师曼·雷的有幅名作亦以此为名。——译者注

Dodds)。他们为理解古代世界设立了截然不同但同样要求甚高的标准。顺带一提,这两人在牛津并未得到毫无保留的赏识。弗伦克尔被公共休息室的学生圈子恶意地描绘成日耳曼傲慢的怪兽。当然,在遇到草率的或装腔作势的错误时,他可能让人胆寒,但是,他在教授中所传达并且教会人们去尊重的品质,正是谦卑地去面对晦涩复杂的语文学事实。尽管他拥有的古典学识,其水准在我看来在世者无人能匹,但在和被他称为“伟大的列奥”^{*}的大师相比时,他却自认浅陋寡闻。 xi

如果说弗伦克尔有时被门外汉贬损,多兹则是被学问们低估了(毋庸赘言,学问和门外汉有时是同一群人)。多兹的政治态度极为自由,对社会科学兴趣浓厚,身为诗人和诗人们的朋友的他,还是个极富想象力的学者。他在1949—1950年间曾作萨瑟讲演,其成果是该系列著作中最有益后人、影响最持久的一本,^③也是在主题上和本研究最接近的一本。我还是学生时,他也对我很是友善,因此,尽管我的这项研究不能完全匹配他所实践的那种学术,我还是很希望它可以算作向他的致敬之作。

我要感谢很多人、很多机构。感谢巴黎的“人类科学之家(*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以及它的主管克莱孟·埃莱尔(*Clemens Heller*),1981年我在那里度过一段成果丰硕的时光。同年,我在肯特大学的艾略特讲座中讲授了本书部分材料的早期版本。我感谢这一邀请,我也很抱歉,由于我所做的这些讲座变成了当前这种极不寻常的形式,这使得它们没有资格出现在以该讲座命名的系列丛书中。剑桥古典系邀请我在1986年作J. H. 格雷讲座,这让我的某些想法更接近它们现在的样子。更晚些时候,我有机会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弗福德学院、密歇根大学、华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讲座和论文中提交本书中某些章节的早期版本。这些场合的讨论和评论让我受益匪浅。 xii

* 应指弗伦克尔在哥廷根的导师弗雷德里希·列奥(*Friedrich Leo*, 1851—1914)。——译者注

③ 《希腊人与非理性》(*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简写:GI)。

4 羞耻与必然性

在我被邀请作萨瑟讲座和实际作讲座之前的这段时间,我成为了伯克利的一名教员。古典系的教员们,无惧于这一史无前例极不寻常的情况,给予我这个哲学系的访客同样殷勤和热诚的欢迎,如同他们惯常给那些来自其他机构的萨瑟讲演者一样。特别是托尼·朗(Tony Long),不仅做了人们能够要求系主任所做的一切,而且使我能够受益于他自己有关讲座主题的工作(特别是第二章),表现出他作为诤谏益友和慷慨同事的一面。我有特别理由要感谢古典系其他同事:乔瓦尼·费拉里(Giovanni Ferrari)、马克·格里菲斯(Mark Griffith)、唐·马斯特罗纳德(Don Mastronarde)和汤姆·罗森迈尔(Tom Rosenmeyer)。我感谢大卫·恩格尔(David Engel)和克里斯·西奇利亚尼(Chris Siciliani)的研究助理工作。在多琳·B. 汤森人文中心(Doreen B. Townsend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举办过两次有关这些讲座的讨论班,对我帮助很大,为此我特别感谢保罗·阿尔卑斯(Paul Alpers)、萨缪尔·舍夫勒(Samuel Scheffler)和汉斯·斯卢加(Hans Sluga)。

其他朋友和同事慷慨给予了评论和学术帮助。有的在本书准备阶段阅读了全书或部分章节。我要感谢茱莉亚·安娜斯(Julia Annas)、格伦·鲍尔索克(Glen Bowersock)、迈尔斯·伯尼耶特(Myles Burnyeat)、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海伦·弗雷(Helene Foley)、克里斯托弗·吉尔(Christopher Gill)、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斯图亚特·汉普希尔(Stuart Hampshire)、斯蒂芬·克纳普(Stephen Knapp)、乔纳森·里尔(Jonathan Lear)、杰夫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安娜·米凯里尼(Anne Michelini)、艾米·穆林(Amy Mullin)、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鲁斯·帕德尔(Ruth Padel)、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奥利维尔·塔普林(Oliver Taplin)和大卫·维金斯(David Wiggins),感谢他们各自的善意。而错误毫无疑问是我自己的。

2008 年版序言

xiii

伯纳德·威廉斯(1929—2003)是现时代英语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作品展现出概念的精微、扣人心弦的论证、想象力、对文学的敏感和充满人性的令人惊异的结合。它们也比大部分学院哲学更容易亲近普罗大众,借威廉斯一本论文集的标题来说,这是由于他(特别是在他职业生涯后期)对理解人性意义的强烈兴趣。^①威廉斯早期两部著作的标题——《自我的问题》和《道德运气》雄辩地展现了他的这一特殊贡献,这在《真理与真诚》这部他过早辞世前完成的最后著作中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②这并不是说,威廉斯畏避职业哲学家们在学术刊物上争来论去的技术问题。他针对人格同一性、科学实在论和意愿自由等论题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是,如他显赫的职业生涯所展现的那样,他愈发专注伦理学,专注于他眼中的哲学能做什么,更特别的是哲学不能做什么,以此帮助我们过上道德上令人仰慕和有意义的生活。

xiv

威廉斯对伦理名下所包含内容的理解,比大多数当代哲学家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他们一贯的实践中所使用的这一概念要宽泛得多。他的著作涵盖大量政治论题,它们展现出对历史的深切关怀,既包括哲学史,也包括古典时期的历史。这一连串错综的兴趣鲜明地呈现在《羞耻与必然性》一书中。显而易见,这本书重点分析了标题中的两个

① 《理解人性的意义和其他哲学论文(1982—1993)》(*Making Sense of Humanit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Paper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② 《自我的问题:哲学论文(1956—1972)》(*Problems of the Self: Philosophical Paper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道德运气:哲学论文(1973—1980)》(*Moral Luck: Philosophical Papers 1973-198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真理与真诚:论系谱学》(*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2)。

2 羞耻与必然性

主题,以及责任和能动性这些主题是如何在希腊的文学和哲学中展开的。威廉斯对这些论题的处理透辟入里,在语文学上精准可靠——这是对古典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其中也充满他的哲学和文化洞见,以及对于这一题材深切的个人投入。正如他在第一章的末尾,以他那无从模仿的文风评价希腊人:“他们能告诉我们的不仅是我们是谁,还有我们不是谁:他们可以斥责我们的自我形象的虚假、片面或是局限。”(20页)*

xv 《羞耻与必然性》一书诞生于威廉斯198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萨瑟古典文学教授时所做的六次系列讲座。每年,伯克利的古典系都会邀请一位学者作为来访的同事在大学里待上一学期,其职责是就他或她所选论题做一系列讲座,并教授一门研究生讨论课。萨瑟教席的任命在古典学者圈里堪比诺贝尔奖。在威廉斯的萨瑟教任职内,我极其幸运地担任古典学系主任。因此,我不仅有幸聆听他的六次讲演,而且每一次还可以介绍他。在这些讲座以本书的形式出版之前,我们之间也有过很多讨论。

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威廉斯如果当初是在美国接受的高等教育,那么,他能够具备胜任古典学者必需的卓越品质,这或许就会令人困惑难解。实际上,在英国的高中和牛津大学作学生时,他就曾获得良好的语言和歷史训练,只要他愿意,他足以胜任古典学教授或者专精古代哲学的学者职位。尽管他转而选择我先前提到的方式,作为一名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而闻名于世,但是,他所受的古典学教育和他对古希腊文学和哲学的兴趣闪耀于他整个职业生涯,尤其是在他晚年的岁月里。他不仅在谈论荷马诗歌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而且在用希腊原文向他的听众引述这些文本时找到极大乐趣,这一点对于每个参加他的萨瑟讲座的人都再清楚不过。我们这些伯克利的古典学家再也选不出一位萨瑟教授,能比他对古典文学富有感染力的热情更加清晰可触。

《羞耻与必然性》1993年在加州大学出版社甫一问世,即成一时传诵之经典。此书的立足点平易可亲,但与诸多现代学者不同,威廉斯宁

* 此处的页码指英文版页码,即本书的旁码,下同,不另注。——译者注

愿让他的读者自己思考和作出反应,而不是自己用一个冗长的导论来总结一切或是明确地告诉读者他来自何方。实际上,当我们将此书置于威廉斯早先兴趣的语境中,它的论证力会获得更多关注和意义,这对任何细心的读者都是不言自明的。由于威廉斯决定在《羞耻与必然性》中不把这些明白地表达出来,我在这里提供一个简短的论述。^③

1981 年,威廉斯发表了一篇出色的希腊哲学概述。^④ 在引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柏拉图归于特拉绪马科的“自我中心的……理性”时,威廉斯注意到特拉绪马科的立场的历史根基和魅力源自“贵族或封建道德”,荷马的英雄们高度重视在竞争中获取成功,即为明证(243 页)。对于这样一种道德,他指出,“羞耻是一种支配性观念,而对耻辱(disgrace)、嘲笑和丧失特权的恐惧则是一个主导动机”。然而,我们不应认为引起羞耻的只是在富有竞争性和展示自我的功业中的失败,触发它的也可以是“未能按照某种所预期的自我牺牲或互助合作的方式行事”:

用基督教……世界观(outlook)作为标准来衡量希腊人的态度,这鼓励了此二者(案:即竞争成功的价值和羞耻的产生)的混淆。这种世界观将道德同时与善意、自我否认、内向型(inner directedness)或罪责(在上帝或自身之前的羞耻)联系起来。它将道德思想向着这一点的发展看作进步,它往往将那些由于这一进步而被废弃的——或者至少是声誉受损的——诸多不同的想法纠缠在一起。(244 页)

这一段文字信息稠密,当回过头来读时,可以把它看作为《羞耻与

③ 以下所述,我扼要摘自 A. 托马斯编辑的《伯纳德·威廉斯》(A. Thomas ed., *Bernard Williams*)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所撰写的文章。

④ 《哲学》,载 M. I. 芬利编《重估希腊遗产》(M. I. Finley,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牛津:克拉雷登出版社,1981),202—255 页。威廉斯在《羞耻与必然性》中并没有引述这一研究。该文收录于 M. 伯尼耶特(M. Burnyeat)编辑的他的论文集,题为《过往的意义:哲学史论文集》(*The Sense of the Pas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6)。

必然性》设定了基本议程：尤其是后一本书对荷马的密切关注，确认羞耻既可以推动竞争也可以推动合作行为，对基督教道德观的负面评价，以及批判进步主义论者的道德观含混不清而且脱离诸多人类经验。

xvii 在这篇概述中，威廉斯发现希腊伦理学的一些方面很成问题：例如苏格拉底的理想，即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总是有“更强的理由去行正义的行为……而不是粗鄙的、短视的、自私的行为”，还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性格的理性整合”（249—250 页）。然而，威廉斯在总结时得出结论：在很多方面，“希腊人的伦理思想不仅迥异于大多数现代思想，尤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现代思想，而且状态更佳”（251 页）：

它没有也不需要上帝……它最为核心和首要的是性格的问题，是道德考虑如何植根于人性之中：它追问何种生活对于个体而言是理性的。它不使用空白的绝对命令。实际上——尽管我们经常为了方便起见使用“道德的”一词——这一思想体系从根本上次缺道德这一概念，这里的道德指这样一类理由或要求，它迥然不同于其他类别的理由或要求。

……与此相关，在公众的“道德规则”世界和私己的个人理想世界之间并不存在裂隙：有关如何规约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的诸种问题，既存在于社会语境也存在于更加私己的语境之中，不能将它们同有关何种生活值得度过以及何物值得操心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

威廉斯承认，希腊哲学家对这一世界观的运用既不能完全恢复，也并非全然值得钦佩：我们既不能栖居于希腊城邦，我们当然也不应赞同希腊人对奴隶和妇女的态度。此外，他还发现希腊人的伦理思想，同“此后多数伦理观”一样，建立在一种“客观的人性目的论之上”，而就此而言，“自某些[公元前]5 世纪的智者开始质疑以来，或许没有人比我们现在更能意识到必须抛开这一点”（252 页）。尽管如此，他赞同希腊的哲学伦理学，因为它代表了“极少数成套想法中的一种，现在仍有助于将道德思考转化成同现实的真诚接触”。

xviii

在这篇 1981 年概要的末尾，威廉斯从希腊哲学转向悲剧。同他对

荷马式价值的扼要评述一样,他在这里简要地勾勒了他自己后来在《羞耻与必然性》中大大扩展的想法。尽管希腊哲学,“在它对理性自足性的一贯追求中”,试图将美好生活同偶然相隔绝,希腊文学特别是悲剧却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伟大的东西是脆弱的,而必然的则可能是破坏性的”(253 页)。这一段鲜明地标示出威廉斯对尼采有限的认同:

考虑到西方哲学之希腊根基的范围、力度、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点反而更引人注目,即我们可以也应该严肃对待尼采的评述:“希腊人最伟大的特征之一是他们无力将最杰出的东西转化为反思。”

促成《羞耻与必然性》一书的萨瑟讲座,给了威廉斯一个机会去详尽阐述尼采的箴言,这显然是他所享受的机会,因为这本书最为突出的特征,正是威廉斯带着同情去接触荷马和希腊悲剧作者隐含(implicit)的伦理学和心理学。同样突出的是,在《羞耻与必然性》中,令人吃惊地同《希腊遗产》一书中他所撰写的概述章节形成鲜明对照,威廉斯针对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的道德心理学采取了强烈的批判姿态。要理解这一转变,我们应当考虑威廉斯对他所说的“道德”或“道德体系”的怀疑论挑战,正如他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中所述——该书写于有关希腊哲学的概述文章之后,《羞耻与必然性》之前。

《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以威廉斯诸多早期研究为基础,对当代道德哲学的融贯性、心理可行性和现实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尽管他讨论了大量“伦理理论的不同风格”,他批评的主要目标是承袭自康德的“道德义务这一特殊观念”,他将其刻画为“几乎我们所有人的世界观(outlook),或者含混地说,我们世界观的一部分”(174 页)。威廉斯在道德义务概念中找到的问题包括,它无条件地宣称它通杀(trump)所有其他类别的动机;它关注假定为自律的意愿,而这并不能由个人的气质(dispositions)、兴趣和社会角色确定;而且,概而言之,它与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生活经验相隔绝,而个人的世界观既是部分共享的,也是以有意义的方式个人化的。这本书展示出对如下想法的全面挑战,即

哲学反思只凭借自身就能产生伦理规范,而且可以脱离人们的社会语境和心理特殊性来塑造他们的世界观。

威廉斯将如此刻画的“道德体系”在上述诸多方面同希腊哲学伦理学相对比,以此推进对前者的批判。然而,这本著作一开篇,他就怀疑是否存在一种道德哲学(现在包括希腊人的道德哲学)“能够合理地期待可以回答人应如何生活这一问题”(1页)。尽管如此,他将苏格拉底问题视为“道德哲学最好的出发点”(4页),因为泛泛而言,这一问题对特定的“道德”考虑或有关义务或善的假定不置可否。用威廉斯的话说,苏格拉底问题属于“伦理学”而不是“道德”,后者他用来指强调义务观念的狭义的伦理学。

在《羞耻与必然性》中,威廉斯更多的是越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回望荷马和悲剧作者,他们的作品尚未受到哲学的影响——这里的哲学指柏拉图最先正式开创的一种特殊类别的著述和追问方式。在这些
xx 素材中,特别是在它对羞耻和必然性这些关键主题的处理中,他找到证据表明存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它不仅能逃脱他早先对道德哲学的责难,而且,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希腊人(他这里首先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的作者)的道德概念,我们将会在我们自己身上认出”这一世界观。^⑤在下一页,他在另一个出彩的句子中写道:“如果我们能把希腊人从[我们]对他们居高临下的误解中解放出来,那么这同一进程也有助于把我们从对我们自己的误解中解放出来。”有关威廉斯在古代与现代间穿梭的出众能力,不必再说更多,以免败坏读者的胃口。与其如此,我更愿意在结束时对这本书表达一点个人的体悟。

《羞耻与必然性》的出色体现在它对希腊素材的处理上,但它最予人启发、引人入胜的是,它向我们展示了威廉斯这个极富创造力的哲学家,和他突破严格意义的“哲学”思想和单纯的“文学”想法这一陈腐区分的杰出能力。自从他出版《道德运气》这一影响深远的论著以来,随着他有关安娜·卡列尼娜和假想的高更的精微讨论,他从文学中抽取强有力的洞见的天赋就已经为人所共睹,这尤为突出地体现在《真理

⑤ 《羞耻与必然性》,10页。